编委会

主编
钱江 刘迎胜

副主编
王连茂 丁毓玲

国际学术委员会
王庸武(新加坡) 滨下武志(日本)
普塔克(德国) 休·克拉克(美国)
松浦章(日本) 陈志明(马来西亚)
陈高华 陈得芝 陈佳荣 杨国桢
席龙飞 朱鉴秋 林悟殊

编委会 (排名按姓氏笔画)
王铭铭 刘义杰 刘序枫 华涛
宋帆 李庆新 张箭 陈波
陈尚胜 聂德宁 冉缨晏 焦天龙
谢必震 廖大珂

编辑
陈丽华 李静蓉 王丽明 肖彩雅
林仪 陈少丰
## 目录
### CONTENTS

<table>
<thead>
<tr>
<th>章节</th>
<th>页码</th>
</tr>
</thead>
</table>
|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帆船
Chinese Junks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 1    |
| 蔡薇 刘超 席龙飞/Cai Wei, Liu Chao, Xi Longfei                          |      |
| 宋代海船人员构成及航海方式
The Crew Composition of Chinese Junks and Navigational Skills in the Song Dynasty | 12   |
| 黄纯艳/Huang Chunyan                                                  |      |
| 宋代镇海国新考
New Findings on Cengtan Kingdom in the Song Dynasty                   | 26   |
| 陆芸/Lu Yun                                                           |      |
| 忽必烈的东亚外交政策及禅宗影响
Kublai’s Overseas Policy towards East Asia and the Influence of Zen Buddhism | 33   |
| 乌云高娃/Oyungua                                                     |      |
| 妈祖与明朝中期的倭寇危机: 理论视角的探讨
Mazu and the Mid-Ming “Wokou” Crisis: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 50   |
| [德国]普塔克/Roderich Ptak                                           |      |
| 蔡洁华 译 钱江 校改/Translated by Cai Jiehua, Qian Jiang             |      |
| 康熙六十一年琉球贡使海难事件重构
The Ryukyu Envoys’ Shipwreck in 1722: Reconstruction of the Event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Manchurian Archives | 64   |
| 特木勒/Temur Temule                                                  |      |
越南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海外贸易史——越南学者黄英俊博士的一些观点介绍
Maritime Trad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Vietn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the Vietnamese Scholar Hoang Anh Tuan
顾卫民  钱盛华  编译整理/Translated by Gu Weimin, Qian Shenghua 74

古代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和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海上交流——以考古文物为中心
Maritime Exchange betwee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and Southern Korean Peninsula in Ancient Tim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韩国]金仁喜/In-Hee, Kim 81

郑和与泉州关系新证——族谱里的郑徐联姻
New Findings on Zheng He and Quanzhou: Marriages between Zheng and Xu Families as Recorded in Lineage Genealogy
徐恭生/Xu Gongsheng 93

明清之际的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契机与当代启示
Fujian and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吴巍巍 林金水/Wu Weiwei, Lin Jinshui 98

“八闽”源流考
A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Ba Min
赵荔/Zhao Li 117

“行舟致远: 扬帆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ailing on the Silk Road”
荣亮  尤泽峰/Rong Liang, You Zefeng 128

“重新连接中国与穆斯林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Re-linking China and the Muslim Worl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 Overview
马建福 周晶/Ma Jianfu, Zhou Jing 133

“宋元交替时期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学术研讨会综述
Symposium o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Southeast Coastal China from Late Song to Early Yuan”:
A Report
肖彩雅/Xiao Caiya 137
声明

本刊已加入万方数据数字期刊群，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许可在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凡被本刊录用的稿件，其著作权使用费与稿酬由本刊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编辑部上述声明。
越南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海外贸易史
——越南学者黄英俊博士的一些观点介绍

顾卫民  钱盛华  编译整理

【摘要】海洋贸易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越南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中世纪越南历代统治者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远非消极。在10至15世纪以前，越南与中国以及其他南方国家的贸易从华南一直延伸到越南中部的占婆，这片海域称为“交趾洋”。穆斯林也将他们的贸易活动从华南沿海一直延伸到越南；在1371年到1567年中国海禁时期，越南瓷器进入了远至东非和欧洲的国际市场。越南王朝还在北方的云屯和南方的乂静建立了贸易口岸。到16世纪以后，由于欧洲人来到东亚、越南的内战以及中国商人贸易路线的改变等因素，越南的贸易中心相应地从北方的云屯向南转移到阳京（海防）—太平河口—铺宪—河内一带。

【关键词】越南  古代  中世纪  海外贸易

Abstract: Maritime trad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Vietnam. The medieval Vietnamese rulers held quit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overseas trade. During the 10th and 15th centuries, Vietnam built up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countries to its south in the “Cochin Ocean”, which covered the Gulf of Tongkin to the coast of Champa. Trade in the region attracted Islamic merchants, and during 1371–1567 when China prohibited against maritime trade, Vietnamese ceramic products were exported to the East-African and European markets. The Lý regime even established foreign trade ports in Vạn–Đồn and Nghê–Tỉnh. After the 16th century, owing to the arrival of the Europeans in East Asia, civil wars in Vietnam as well as the trading–route change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the trading centers in Vietnam moved from Vạn–Đồn to Đươn Kinh, Thổ Bình River, Phú Hai and Thòng Long.

Keywords: Vietnam; Ancient Times; the Middle Ages; Overseas Trade

黄英俊博士现任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副教授，是越南新一代研究全球史

黄英俊指出，越南在印度支那的海岸线长达3000公里，这种地形意味着大部分越南的居民都生活在相对近海的地区。面对广袤的大海以及如此众多的船只，本应重视古代以及中世纪旅行家和航海者的作品。但是，由于受到所谓“新史学”^{[2]}的影响，长期以来越南在古代以及中世纪的航海史研究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以越南权威的刊物《历史研究》为例，从1954年至2004年共发表的3782篇论文中，其中经济史占6%，对外贸易仅12篇，大部分文章的主题为反侵略、阶级斗争、农村和土地问题等，有关海洋贸易历史的研究几乎完全被撇在一边。21世纪初，由于国家战略以及经济转向海洋和贸易，才有一些专门的讨论出现，但是也出现了由一种极端到另一种极端的倾向。

黄英俊主张，有关越南海洋贸易史的研究应当采取反对历史研究中的极端主义的态度，以地区史研究的视角，讨论越南在古代以及中世纪融入到东亚贸易中的过程以及17世纪以前越南贸易口岸的演变。黄英俊将越南从古代至中世纪直到近代早期的海外贸易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10世纪的贸易中心以及海上门户

有丰富的考古发现表明，越南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沿海地区居住着众多人口（包括不同种族的外来人口）。当地居民耕种于沿海的平原地区，并与华南、台湾地区、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各地的人民交换产品，当地人民在对外贸易上亦持较为开放的态度。

秦汉时代，越南北方被中国人征服。根据中文史料，中国人知道这片土地非常富有，


[2] 越南史学界称“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新史学”。
出产瓷器皿、犀牛角、象牙、龟壳、珍珠以及翠鸟的羽毛。

在东京湾的北部有多个港口合浦和徐闻，[1] 那里的人民养殖珍珠并拥有珍珠市场，专门从事与南海各地区的贸易。不久以后，这两个港口逐渐地衰落下去，外来的商人开始到访今天河内附近的地区。根据中文史料，1 - 3 世纪，交趾一直是面向中国的贸易门户，位于今天河内附近的龙边（Long Biên）则是主要的贸易港口，外来的商人从那里前往中国进行贸易活动。

3 世纪中叶以后，越南北方爆发了战乱，阻碍了当地的对外贸易，商人们则去往更北的番禺以及广州等地。时局平静以后，他们又回到了红河三角洲。在隋代（581 - 618），广州继续保持繁荣的地位，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地贸易的中心。中国的平底帆船从广州出发前往南海贸易，许多外国的船只也从海上前往广州。到了唐朝（618 - 907），在广州的外国商人拥有前往中国沿海各个口岸贸易的特权，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越南北方海外贸易的恢复，尽管有时越南本地的贸易活动还是十分活跃。

二、越南独立王朝时代的海上贸易以及对外的门户

从 905 年至 1010 年，越南逐步建立了独立的王朝，为以后的大越王国（Dai Viet）的李朝（Ly Dynasty, 1010 – 1226）、陈朝（Tran Dynasty, 1225 – 1400）以及后黎朝（Le Dynasty, 1428 – 1788）的早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 13 世纪，越南三次击败蒙古的进攻，逐渐平定了占婆王国（Cham Kingdom），扩大了南方的边界。这些王朝治理得当、经济发展，特别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在此情形之下，越南诸王朝的统治者致力于发展对外贸易。

越南的历史学家较少注重大越的对外贸易，传统上他们认为大越王朝的统治者并不鼓励对外贸易，他们注重的是抵御蒙古入侵，防止中国人，严格限制外国的商人进入内地的市场，并限制港口的开放。

但是外国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越南当时的海外贸易活动仍然在继续。早在 1986 年，西方学者怀特莫（John K. Whitmore）在研究了李朝和陈朝统治下的北方的云屯以及乂安与河静省的贸易史以后认为，“从海外流入越南的财富有助于当地政权的建立，刺激了当地的经济，外国技艺的引进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他呼吁研究越南的“从事贸易生产的社会基础、贸易组织的方式以及为何社会上产生了多余的产品可以用于对外贸易”[2]。

[1] 合浦位于中国广西省南端，近北部湾（即东京湾）的东北海岸；徐闻位于中国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
越南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海外贸易史——越南学者黄英俊博士的一些观点介绍

其他一些研究越南中世纪海外贸易历史的外国学者如桃木至郎（Momoki Shiro）认为10世纪以后大越尽管不再是南中国海贸易的中心，但是它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海上贸易的收入而不是农业。[1] 李塔娜（Li Tana）则指出，10世纪以后，大越在与中国和其他海外国家的贸易之间仍然承担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从华南到占婆的广大的交趾海域积极参加马匹、食盐以及奴隶贸易。[2]

黄英俊指出，早期越南的统治者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并非消极。1012年，李朝建立以后不到两年，李太祖即李公蕴（1010－1028年在位）曾经向中国朝廷请求允许越南从海路去邕州贸易，尽管宋朝拒绝了这个请求，但是允许越南在广州以及其他口岸贸易。1040年，李太宗（1028－1054年在位）则鼓励本国的丝织业以及出口。他将国家储存的所有中国丝绸都赠送给他的朝臣，让他们制作朝服，这意味着皇帝本人不再使用中国丝绸了。1149年，李英宗（1138－1175年在位）应爪哇以及暹罗商人的请求，将北方的云屯辟为通商口岸；此外，朝廷还允许外来的商人在南方的义静省从事贸易活动，这些口岸从中国和东南亚吸引大量的外来商人。向中国请求通商以及开放这两个口岸表明越南的统治者企图融入到地区贸易中去。

黄英俊指出，当时越南的对外贸易中有如下因素应该加以考虑：
1．15世纪以前，越南与中国以及其他南方国家的海外贸易的航线是以东京湾为中心的，这使得大越有机会发展它的海外贸易。根据11至14世纪商人和旅行者的记录，这片海域从海南一直延伸到东京湾直到越南中部的占婆。当时的航海者称这片海域为“交趾洋”（Jiaozhiyang），越南人积极参加当时的海洋贸易，他们主要从事奴隶、马匹以及食盐等物品的交易。在10世纪以后的几百年里，东亚海域不同的航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中国的港口，特别是广州，吸引了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的许多船只的到来。大越的一些港口，由于它们有利的地理位置，在内陆和沿海地区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7世纪以后，穆斯林商人从东南亚各个口岸直接去中国的广州。他们不仅来到东京湾不同的地方从事贸易，有的人还永久地居住在这里，特别是在华南各口岸以及海南岛。他们不仅参与东京湾的贸易活动，而且卷入了地方的政治活动。在福建泉州，很有权势的穆斯林开宗和蒲寿庚家族，曾被宋朝指定为海上贸易的主管。还有一些穆斯林居住在海南岛，他们人数众多，形成了回回村，他们利用在当地居住的地利之便以及管理海上贸易的优势，积极参加地区的贸易，特别是内陆和沿海地区的物品交换，他们的贸易活动也延伸到了越南。
3．大越企图融入到地区贸易的努力与中国历代王朝企图发展和规范海外贸易的趋势相吻合。这段时间大约从中国的五代（907－960）至宋代，中国的王朝发布了一系列币
制政策，涉及物品交易和税收，以便发展海外贸易。中国人发展海外贸易的态度，影响到越南李朝最初的几代皇帝，他们决定建立云屯海口，并致力于发展南方贸易中心乂静以适应当时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

4、在陈朝末期以及黎朝早期，位于越南东北方的云屯是主要的海上出入口。通过这个港口，中国的瓷器进入大越，被重新装船进入本地区的市场。同时，越南陈朝的酱油瓷以及黎朝的青花瓷则从这里大量地出口。从1371至1567年，由于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中国瓷器不再进入国际市场，大越的瓷器则取而代之，大量地出口，远抵波斯、东非、斯瓦西里海岸、埃及、土耳其、西方、日本和菲律宾。直到16世纪下半叶，由于国外与国内的原因，即越南的内战导致瓷器制造中心的荒芜以及中国于1567年解除海禁，中国的瓷器再度进入地区和国际市场。

三、15世纪中叶至17 世纪早期海外贸易门户的南移

后黎朝（1428－1788）建立以后，在整个15世纪当中，恢复农业，注重军事，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国朝刑律》第612至617条，严禁官民人等在云屯等港口贸易，视海外贸易为非法行为，其指导思想则为儒家重农抑商思想。在黎圣宗（1460－1497在位）皇帝统治时期，朝廷制定严格的规条限制海外贸易。1467年，朝廷严厉对待从爪哇、苏门答腊以及暹罗来的船只，拒绝他们带来的礼物以及重开贸易的要求；同时，大越于1471年征服占婆，摧毁占婆的港口施耐港（Thi－nai，亦作尸耐，在占婆都城毗耶耶附近，在今越南平定省）。这是当时交趾洋海上贸易航线的重要交点，大越则将它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些对于海外贸易的严格控制，以及16世纪最初的二十五年中越南国内的政治动乱，使得大越退出了当时的地区的贸易活动。

在莫朝（Mac Dynasty，1527－1592）时代，虽然内乱，但是由于统治者比较开放的视野以及越南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当时的国内贸易仍然发展。有关越南在16世纪的海外贸易，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有争论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国内经济的恢复与海外贸易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重新检视整个16世纪越南海外贸易的转型，则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有几个外部和内部的因素影响到越南当时的海外贸易：

1、新航线的开辟：16世纪早期西方商人，尤其是葡萄牙人、荷兰人的来到使得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海上贸易区域形成了一些新的贸易中心。葡萄牙人进入亚洲使得南海海域由来已久的北南贸易结构解体了，特别是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留直接将东京湾的贸易吸引到那里，东北方的云屯从那时起就衰落下去了。另一方面，从15世纪早期开始，中国福建的商人开拓出一条新的商路，他们大量经由东南亚去了菲律宾。西班牙人于1571年占领马尼拉以后，美洲新西班牙的大量白银被运往菲律宾群岛。中国商人每年都去往菲律宾，由此建立了“东洋航路”，改变了原先的“西洋航路”，使得原本已经衰落的云屯受到更大的打击，在16世纪下半叶，越南东北方的对外贸易终于衰落下去了。
越南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海外贸易史——越南学者黄英俊博士的一些观点介绍

2、如上所述，1567年中国重新开放海外贸易，中国瓷器再度进入国际市场，越南周
豆、暹罗的苏可府宋加洛县（Sawankhalok）以及占婆的瓦岗村（Gò Sünst）等瓷器中心
的繁荣时代就此成为过往，在16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里，越南的国际瓷器贸易几乎
是一片空白。

3、1527年王朝与莫朝的改朝换代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在16世纪后半叶极大地摧毁
了越南的经济，包括瓷器中心周豆。尽管莫朝统治者对于贸易持开放的态度，试图发展
今天的海防为口岸，但是并没有成功。1592年，莫朝被击败以后，后黎朝郑主政权将海
外贸易的门户移到了太平江口（Thai Binh River），在阳京以南（海防）约20英里。在以
后的一百年内，大越主要的港口贸易一直向南移动，从17至19世纪，越南的主要贸易门
户一直向南方移动，从12世纪到16世纪早期一直在云屯，整个16世纪在阳京，17世纪
到19世纪早期则定在太平江口。

越南的海上贸易门户的持续向南移动不仅仅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变动，有时也是为了适应
地区贸易改变的需要。阳京作为一个门户在16世纪贸易转型时期出现，正式在西方海
洋国家最初渗入到亚洲的时期，越南海洋贸易口岸的向南方转移正与东亚海上贸易新时
代的来到相吻合。从17世纪以后，东亚海上贸易网络由以前不同族群的亚洲商人（中国
人、东南亚人、印度人以及阿拉伯人）逐渐地被新到来的欧洲人（葡萄牙人、荷兰人、
英国人以及法国人）控制。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东亚的海上贸易在结构和性质上
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在17世纪东亚贸易的转型时期，北方的郑氏政权以及南方的阮氏政权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将地区贸易联系起来。在越南的北方，从17世纪开始，郑氏政权的对外贸易达到前
所未有的规模，外国船只主要来到太平河口，它们停泊在离海岸10公里的多梅亚
（Domea），[1]这是一个离海岸线约十英里的下锚地，海关设在铺宪（河内东南方向），大
部分的贸易活动则在皇城河内进行。

在17-18世纪，几乎所有的外国船只都停泊在太平河口，对于原来北方的阳京和云
屯的影响很大。但是，云屯并没有完全消亡，由于它位于北方，在地理上接近中国，所
以仍然繁荣。17世纪下半叶，甚至荷兰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曾经试图在那里建立商站。
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随之而来的清朝与南明的战争、海盗等因素，迫使越南北
方的统治者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收紧对外贸易，终于使得原先的北方贸易中心再也无法恢复
了。

结 语

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地区，东京湾是最为繁忙的海上商业枢纽之一，它吸引着许多外国

[1]“Domea”一词仅见于西方文献，据黄英俊称，此为西方人对于“dò mía”（意为“运输甘蔗的渡
口”）一词的音译。但domea的确切位置目前尚不可考。
商人（中国人、越南人、东南亚人、印度人以及阿拉伯人）前来贸易，这片贸易区的水域从今天的华南一直延伸到越南的中部（当时文献称为交趾海），由此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口岸如龙边、云屯和乂静等。

大越王朝以这些港口作为跳板使自己融入到国际贸易中去，它清楚地反映了一种向南方贸易门户和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转变发生于 11 世纪至 14 世纪的晚期，那时的贸易中心还在云屯，到了 16 世纪，则转移到了阳京（海防），从 16 至 17 世纪，则转到太平河口。就贸易物品而言，16 世纪中以前，主要是豆的陶瓷。豆位位于云屯附近，方便出口，是越南最为重要的瓷器制造业中心。16 世纪以后，北方最重要的出产品是丝，其中有些是生丝，有些是加工的丝绸，生丝的加工主要在红河三角洲的村庄。从 1663 至 1681 年，越南的陶瓷业在东南亚有短暂的复兴，大部分瓷器的加工都在钵场（Bút Trưng）的村庄里，那里接近红河的河岸，与东京湾商业贸易路线以及面向大海的河内商业中心相连。这种出口贸易中心的变迁反映了 16 世纪越南北方王朝在东亚海洋贸易中的商业性质以及地位的演变。

明朝和黎朝的统治者对于贸易都持较为开放的心态，他们允许外国人在内地不同地方居住通商，包括在河内和辅宪，由此，将贸易活动从沿海转向内地。最后，从太平河口 - 富 önlem - 辅宪 - 首都河内一线构成了东京河 (Tonking River) 贸易体系，这是一条最短和最安全的商路，太平河口成为东京湾海上贸易的大门，直到 19 世纪晚期法国人在海防建立条约口岸为止。

作者顾卫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241）
钱盛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15 级博士研究生